### 

南昌大学

盲审学位论文

编号：

**异质文化空间的家国记忆与文化透视**

**——论新移民学者型作家袁劲梅的小说创作**

**专业、领域名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专 业 代 码：** 050106

**种类（在相应方框内打√）：**

全日制学术类博士□

全日制学术类硕士☑

全日制专业学位类博士□

全日制专业学位类硕士□

非全日制博士□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类硕士□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 摘要

袁劲梅的小说因其学院型的思想艺术特质，在北美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本文主要对袁劲梅小说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家国记忆、文化反思和学者化叙事艺术进行深入分析。

在小说中，袁劲梅常常以俯视的姿态审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她从国际、国内两个空间维度描绘了战争的疯狂、残酷，以及对于人性造成的伤害。她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判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等级制和文化陋俗，另一方面在差异视野中展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并提出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最终实现人性的和谐与美好。在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中，袁劲梅赓续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着重批判了国民思想的麻木和精神上的奴性。

袁劲梅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学者化特质。在创作思维方面，她擅长以干预性叙事传达哲理性的思考，引导读者接受预设的观念；在表达方式上，她一方面灵活运用历史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知识展开跨界书写，在谨严的文风与丰富的知识蕴含中展现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她在创作中以“问题”开场，以整个文本作为答卷，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呈现出逻辑论证式的文本结构。另外，袁劲梅幽默的讽刺艺术中和了小说中批判的尖锐与理论知识的枯燥，读来妙趣横生，呈现出学者小说的审美魅力。

**关键词**：袁劲梅；历史文化反思；华文文学；学者小说

# ABSTRACT

Yuan Jinmei's novels are unique in North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eir academic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mainl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Yuan Jinmei's novels in the context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in terms of home and country memory, cultural reflection and scholarly narrative art.

In her novels, Yuan Jinmei often looks down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criticizes the inferiority of the people. She depicts the madness, cruelty, and damage to human nature of war from two spatial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On the one hand, she ruthlessly criticizes the hierarchy and cultural customs based on Confucian ethics, on the other hand, she shows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 and pro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harmony and beaut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reflec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Yuan Jinmei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the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and emphatically criticized the numbness and spiritual servility of the national thought.

Yuan Jinmei's novels have distinct scholarly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reative thinking, she is good at conveying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rough interventional narratives and guiding readers to accept preset concepts; in terms of expression, she flexibly uses knowledge of history, philosophy, biology, and psychology to write cross-border writing , show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inking in the rigorous style of writing and rich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she opens with "questions" in her creations, uses the entire text as the answer sheet, analyzes and solves problems, and presents a logical argumentation style. text structure. In addition, Yuan Jinmei's humorous satirical art neutralizes the sharpness of criticism and the dullnes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the novel. It is interesting to read and presents the aesthetic charm of scholar's novels.

**Key Words:**Yuan Jinmei;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 Fictio

### 目录

第1章 [绪论 1](#_Toc11615)

[1.1选题依据及意义 1](#_Toc22914)

[1.2研究综述 2](#_Toc20582)

[1.3本文结构 5](#_Toc22785)

[第2章 深邃通彻的历史反思 7](#_Toc6605)

[2.1走不出的变革怪圈 7](#_Toc8253)

[2.2 暴力战争的“疯狂” 10](#_Toc26720)

[2.2.1 “恶何以滋生” 10](#_Toc7123)

[2.2.2 悲悯人性创伤 12](#_Toc17242)

[第3章 睿智洞达的文化透视 14](#_Toc5842)

[3.1 传统文化的深入呈现 14](#_Toc20268)

[3.2 差异视野中的中西文化 18](#_Toc6921)

[3.3 文化融合之路 20](#_Toc28961)

[第4章 启蒙主义映照下的国民性批判 22](#_Toc14465)

[4.1 思想的麻木 22](#_Toc24926)

[4.2 精神的奴性 23](#_Toc5631)

[4.2.1 对“权威”的盲从 24](#_Toc9698)

[4.2.2对“金钱”的依附 25](#_Toc31378)

[第5章 学者化的叙事风格 27](#_Toc1639)

[5.1 哲理性创作思维 27](#_Toc16491)

[5.2 学理性表达方式 29](#_Toc18508)

[5.2.1 丰厚的知识底蕴 29](#_Toc25487)

[5.2.2 问题推演式的逻辑文本 31](#_Toc15104)

[5.3 讽喻式写作风格 33](#_Toc13106)

[结 语 36](#_Toc8316)

[致 谢 37](#_Toc8880)

[参考文献 38](#_Toc6860)

###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袁劲梅是江苏南京人，自河海大学、南京大学毕业后，于1993年赴夏威夷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University）哲学教授，研究符号逻辑和比较逻辑学。除了在学术领域的学者身份外，袁劲梅还有另外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身份——北美新移民作家。

著名学者陈瑞琳认为， “北美近20年来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的精神轨迹经历了“由‘移植’的痛苦, 演绎出‘回归’的渴望, 再由‘离散’的凌绝, 走向‘反思’的‘超越’”[[[1]](#footnote-0)]。20世纪60、70年代,北美华文文学作家群体以台湾留学生为主,初入美国的留学生们在创作中主要表现浓重的“文化乡愁”，揭示了精神上的“无根”之苦。进入80年代,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体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他们积极地面对异域生活,既不抛弃原有文化故乡的精神血脉,又积极主动地融入异乡主流文化。面对文化的隔阂，他们虽有时也会流露出孤独和苦闷,但以更从容的心态面对中西两种文化。而到了90年代以后，新移民作家的创作跳脱出“乡愁”“漂泊”“感伤”的文学主题,更自如地接受“边缘人”“局外人”的身份，其文学写作往往聚焦于中西文化差异、探寻人的生命意义，为世界提供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创作文本。

新世纪以来，袁劲梅以《忠臣逆子》在华美文坛上崭露头角，展现出了新的创作特点，她并不看重“边缘人”“局外人”等文化身份，在她身上展现出“世界人”的从容俯视。在理性审视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她不满足于仅仅呈现文化差异，而是沿着社会现象、文化冲突一直追溯至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并深挖文化磁场影响下国人的劣根性。她身处异乡回望故国，跨文化的生存环境使其能够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理性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勘透循环往复的历史怪圈与文化劣根，并试图找出破局之路。她以人道主义情怀诘问暴力战争所带来的人性创伤，展现出无国别的悲悯意识。

作为一名哲学教授，在专业领域练就的哲学意识和逻辑思维使她在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深广度上区别于一般小说家，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和哲理的深刻。她自觉地在“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中切换，在合适的审美距离中独立思考，在游离的文化状态中重新探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其小说往往在卷首语或篇章标题中以引经据典的方式表明论述的问题，接着在文本情节中旁征博引，灵活运用历史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文化资源，论述问题寻找答案，展现出跨界创作的自觉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哲学思考也增加了小说的思想厚度。

夏志清曾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2]](#footnote-1)]。袁劲梅的身上展现了古今往来知识分子匡时济世的胸怀，她注重对文化的审视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内化为小说中忧国恤民的精神品质。她始终坚持独立的写作立场，在“商业化”“私语化”的当代文学环境中，逆潮而行，不委婉，不曲折，她就是要“撕破脸皮”。在她身上我们往往能感受到她对于文化和历史的一种深深的焦虑和自省，但她没有回避，而是选择勇敢地直面痛苦和焦虑，并通过写作来寻找破题之法。更重要的是，她在理性反思之后，提出了改良的方案，表现出了文化重建的信念和决心。她曾说：“我觉得文人对社会更大的责任在‘进谏’。”[[[3]](#footnote-2)]怀着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袁劲梅在异质文化空间审视中国百年历史和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中堪透文化痼疾。笔者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袁劲梅的小说创作既看到了当代中国内部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又尝试引入普世性价值标准以帮助母国文化探寻21世纪的全球化定位，研究袁劲梅的作品不但具有文学上的价值，也具有干预“社会人生”的文化价值。

#### 1.2 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袁劲梅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疯狂的榛子》与《罗坎村》两部小说，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小说的内容，而袁劲梅小说中展现的学者气质与叙事艺术则较少有人论及。总的来看，学术界对袁劲梅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对袁劲梅小说价值功能的分析。汪注《<青门里志>的思想意蕴分析》肯定了袁劲梅在《青门里志》中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群体理性缺失的揭露，认为袁劲梅提出的化解之道值得参考。刘复生《罗坎式现代化启示——评说<罗坎村》肯定了袁劲梅对于以往同类作品故事模式的突破与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认识，但也指出其启蒙观念的陈旧与历史的片段化，从而导致了批判的迂阔与非历史化；在《普世主义的文学残梦——以袁劲梅小说<罗坎村><老康的哲学>为例》中，他一方面肯定了袁劲梅小说的启示性力量，另一方面质疑其对美国价值的美化与非历史化的不适当处理。杨华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指出袁劲梅作品的部分情节、细节存在片面性问题，认为袁劲梅希望以普世价值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却最终展现了“走向普世的虚妄”。赵依的《理性的抵达：袁劲梅小说论略》中肯定了袁劲梅小说在新时代的文学意义空间的开拓价值及袁劲梅学者气质中的理性风格。丰云、仲冲的《启蒙主义映照下的新故乡叙事——论袁劲梅的创作》中分析了袁劲梅在启蒙性心理作用下以西方文化反观传统伦理和民族心理积淀中的痼疾与沉珂。此外，郝朝帅《海外写作的一种“症候”--由<罗坎村>谈起》从袁劲梅与现实中国的隔膜来分析其小说内容的不真实性。

二、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主题的讨论。首先，分析文化身份建构以及中西文化差异的论文数量较多，如秦姣娟的硕士论文《北美新移民中的去离散特质》从创作心态、人物形象、文化批判三方面分析袁劲梅作文学创作中的“去离散”特质，得出袁劲梅认可并自足于“边缘人”身份的结论。王泉《文化焦虑与人性守望—一袁劲梅小说之“道”》以《月过女墙》小说集为主要研究文本，围绕袁劲梅的文化他者身份，点出其作品中文化焦虑意识背后的“寻根”本质。王宗峰《于边缘处求索- - -评析袁劲梅的流散小说<罗坎村》》从中西文化对比出发，分析袁劲梅对于文化身份的寻觅与文化归属的求索，并将袁劲梅的中西对比视角阐释为“批判性世界主义”。李雪梅《论袁劲梅的小说创作》指出袁劲梅平视中西文化的视角，分析在文化价值观与教育伦理的冲突中，作者对于文化归属之地的寻找。马倩娜《文化改造与认同的新思考一一论袁劲梅小说<罗坎村>的价值》分析袁劲梅对于鲁迅小说“归乡模式”继承，展现袁劲梅处理身份认同焦虑的新见解。张慧《异域文化下的“父子”冲突一评<老康的哲学>》主要从内容、艺术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作者的差异文化视野。此外，对于袁劲梅的东西文化融合观也有学者论及。如江少川《袁劲梅：地球村视域下的跨文化寻找》通过分析《老康的哲学》《罗坎村》两篇文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作家的自白及感悟，认为袁劲梅有调和中西文化的理想。杨会《夹缝中的分裂与弥合一一论袁劲梅小说》以小说集《月过女墙》为研究文本，分析袁劲梅探寻东西方文化互补可能性的努力。刘金香《评袁劲梅中短篇小说集<月过女墙》从中西文化反思、现代文明反思、人性反思三个方面来展现袁劲梅对于未来社会文明的期望。其次，还有一些论文关注袁劲梅对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和人性的反思。沈杏培《中国形象“三重奏”: 文化差异·人性创伤·民族志 ——美籍华裔作家袁劲梅<疯狂的榛子>解读》从中西文化对比视角出发，谈袁劲梅作品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王萍的硕士论文《人性刻写与文化省思：袁劲梅小说论》将文化与人性综合考察，着重分析袁劲梅小说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人性劣根。王春林《文明的高度与历史的反思》认为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中通过对战争伦理、社会政治、民族陋俗三方面问题的描述与揭露，上升到对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张艳梅《新移民文学的文化伦理背反——以袁劲梅小说为例》通过分析罗坎村这个典型叙事空间及老康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袁劲梅的文化反思主题。倪学礼、张祺《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反思——以<芳华><忠臣逆子>为例》从集体无意识、传统文化的荫蔽、主流意识形态三方面分析袁劲梅对中国文化所进行的根本性反思。

三、对袁劲梅小说叙事技巧的分析。如刘汀的《疯狂的文本与历史PTSD症》肯定了《疯狂的榛子》较以往新历史主义小说更具纵深感与深刻性，但也指出其话语过于杂糅、文本结构过于复杂等缺点。欧阳光明《新移民作家理念性写作的

尴尬与危机---以袁劲梅小说为例》指出袁劲梅的小说存在结构僵化、语言及主题重复、理念性过强、人物形象扁平等缺陷。黄国辉的《袁劲梅<疯狂的榛子>:为了爱，一直疯》从故事架构、人物关系、情节脉络等方面肯定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徐刚的《因爱之名的历史叙事》肯定了《疯狂的榛子》一书中叙事结构的精致，探讨了其人性背景和政治哲学思想。王萍的硕士论文《人性刻写与文化省思》从思辨性的文本结构、叙事干预的叙事手法、对比叙事、语言艺术等四方面分析了袁劲梅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对袁劲梅小说叙事技巧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

另外，针对袁劲梅小说创作的教育伦理思想、生态意识也有论文论及，如黄秋燕的硕士论文《论新移民文学中的子女教育叙事》、刘红英《新移民作家创作中的教育伦理思想与文化立场——以黄宗之、施雨、袁劲梅为例》以及丰云的《自然中的人——论华人移民文学中的生态意识》。

综上所述，与其他新移民作家相比，有关袁劲梅的小说创作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其文章的价值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目前学术界对袁劲梅小说内容的研究集中于小说价值功能的分析、文化身份的建构、中西文化比较三方面。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部分基本聚焦于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参照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将中西文化置于对立冲突的关系中，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袁劲梅在作品试图寻找文化融合与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努力。对于袁劲梅作品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基本从批判的角度进行分析。诚然，袁劲梅以“疗救”的目的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痼疾，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浸润下的文人气质，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道家古朴洒脱文化的青睐。因此笔者意在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切入，以全球性目光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利与弊，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以丰富文化主题的研究。

在作品内容之外，学术界更为关注小说的叙事技巧与文本结构，而忽略袁劲梅哲学教授身份对于写作的影响。笔者认为，学者身份带来的哲理性创作思维与学理性表达方式是袁劲梅区别于其他新移民作家作品风格的重要标志。袁劲梅写作的切入点与思考的深度也与其在哲学领域的研究脱不开关系。袁劲梅巧妙地哲学宏大命题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并运用逻辑推演式文本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展现出丰富的知识蕴含与理性逻辑思维，其“学者-作者”双重身份写作所产生的张力同样值得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并结合叙事学理论及心理学、生物学、哲学的相关知识对袁劲梅的小说的历史文化反思主题与学者化叙事艺术进行全面地分析。

第1章，分析袁劲梅作品对于历史的反思。她以俯视的姿态审视中国的历史，一方面着重描绘了循环往复的变革怪圈与人的“集体返祖”危险，展现了“文革”时期人民的风声鹤唳与集体无意识地排除异己，另一方面，从国际、国内两个空间维度描绘了战争的疯狂、残酷，以及对于人性造成的伤害。

第2章，分析袁劲梅对传统文化痼疾的审视。她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判“大一统”理念下的排除异己、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等级制、边缘乡村的文化陋俗，另一方面在差异视野中展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并提出文化融合的可能性，那就是以中国文化的古朴、情真融合西方文化的公正法制、自由平等，最终实现人性的和谐与美好。

第3章，分析袁劲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新时期，她展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关切，她一方面揭露国民在三千年文化磁场中形成的思想的麻木和精神的奴性，另一方面又结合建国以来的具体社会事件，分析国民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新特点，其笔触深刻而又冷酷，体现了鲜明的国民性批判指向。

第4章，分析袁劲梅创作中的学者化特质。在创作思维方面，她擅长以干预性叙事传达哲理性的思考，引导读者接受预设的观念；在表达方式上，她一方面灵活运用历史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知识展开跨界书写，在谨严的文风与丰富的知识蕴含中展现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她在创作中以“问题”开场，以整个文本作为答卷，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呈现出逻辑论证式的文本结构。另外，袁劲梅幽默的讽刺艺术中和了小说中批判的尖锐与理论知识的枯燥，读来妙趣横生。

结语部分分析袁劲梅创作的价值与局限。她以知识分子立场自觉反思故土记忆，并进行理性的思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然而，袁劲梅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进行写作，使其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化缺陷和主题先行色彩，与故国的时空距离也使其小说出现情节、人物雷同的现象。

### 第2章 深邃通彻的历史反思

身处异质文化空间，袁劲梅把创作重点放在自己曾经有过的国内经验上。她身处异乡回望故国，跨文化的生存环境使其能够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理性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的百年变革是袁劲梅在小说中重点呈现的历史阶段，通过研究祖辈们的“变革-失败”的人生模式，她勘透出一段循环往复的变革怪圈。在反思暴力革命与战争时，她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中残留的兽性和群体无理性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在诘问“平庸之恶”的同时，她也表露出对和平的呼唤与人性的悲悯。

#### 2.1走不出的变革怪圈

“文革”前后正是袁劲梅的成长年代，那时学校停课，“母亲就在家里督促她阅读古典小说，给她讲解唐诗宋词，并且批改她写的每一篇作品。”[[[4]](#footnote-3)]可以说，袁劲梅是书中那个特殊时代的亲历者，拥有难忘的童年经历。另一方面她也从长辈的遭遇中探到变革乱象的苗头，在采访中她提到：“我父母那一代学者，小时候上过私塾，少年时期恰逢战乱，大学受的又是西洋式教育。他们经历了破和立、新和旧，常常处于矛盾之中，面临种种考验。”[[[5]](#footnote-4)]在国外生活多年后，她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结合自己的童年经验与历史回忆，在《明天有多远》《忠臣逆子》《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中皆展现了几代人的上下“求索” ，又描绘了改革在知识分子——城市市民两个文化场域的不同特点。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中，袁劲梅着重描绘了变革屡屡陷入“浮躁”化窘状和以破坏、混乱收场的困境。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变革”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浮于表面”的特点。浮躁的变革怪圈在“苏邺风”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青门里始露苗头。自新文化运动引入西风抨击传统文化以来，中国固守三千年的等级秩序与宗族文化就陷入了权威被质疑的窘境里，而青门里的父辈们恰好就是“从《家》、《春》、《秋》走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先是接受孔子思想的熏陶，后又走上新文化运动道路，推翻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最后将自己打造成为国为民的“战士”。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所谓“正确”思想的指导，以笔为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却发现自己被批为“阶级异己分子”，而他们接受的改造却是把知识分子重新变为农民，他们用心良苦的变革，转了一大圈仿佛回到了原点。书中还有一情节彰显了变革的无力性。苏邺风的母亲抄录毛主席语录时因遵循语法规则而错抄了一字，便被红卫兵批为反动并不断地被侮辱，甚至还有性命之虞。被朋友救助后，她竟认为是毛主席派人救了她，接着留下遗书便上京“告御状”了。她的内心仍深埋着封建等级制的种子，“德先生”“赛先生”来到了中国，却没有落地生根，像“我”母亲般的知识分子只学到了皮毛，变革并不彻底。

在《青门里志》的另一文化场域——城市市民群体聚集的剪子巷，外面锣鼓喧天的变革似乎并未留下痕迹，在青门里人被批判与改造的同时，剪子巷里的小市民们过着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随着童年“苏邺风”的视角，这片桃花源似的小世界逐步呈现在读者面前。“苏邺风”初至剪子巷就见证了“法律”的边缘化地位。在这里，千百年来传承的“规矩”能管辖到“偷淘米水”“偷水”等鸡毛蒜皮的纠纷，而对于“打麻将”一类违纪违法的事，市民们却乐此不疲，法律只能作为辅助裁判，其权威被削减。另外，在青门里已经销声匿迹的封建宗族制作风在剪子巷中却根深叶茂。“小苏邺风”到剪子巷的第二天清晨便依规矩单独拜见了20多个“上人”，接着她又见识了剪子巷的“早请示”：“老太爷老太太坐在靠背椅上，桌子两边一边一个。人们轮番进来问安......接下来，各人向毛主席请示......最后，一天井人转着圈儿跳起了‘忠字舞’，老太爷和老太太都坐下来看，一脸悦色。”[[[6]](#footnote-5)]单看“早请示”的形式，会让人感觉仿佛身处清朝末年，老太爷、老太太便仿佛一个宗族里的“皇帝”与“皇后”，接受子孙们的供奉与朝拜。然而“毛主席像”却突兀地出现在“早请示”的画面中，仿佛一根变革的羽毛轻飘飘地落在蒙尘的世界，但仅此而已，剪子巷把它高高挂起，继续过着千百年如一日的传统生活。造反派对剪子巷的“破四旧”行动制造起堪称轰动的波澜，但作为造反派领头人的魏青山在对抗时竟跪倒在宗族家长的权威之下，新时代的浪潮并没有撼动剪子巷的传统文化基础，八爷已经弄了一些灰色的小碎砖，磨来做一幅新的麻将牌。他们逍遥在革命风暴之外。剪子巷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孤本，相反，它代表了中国广大市民群体的思想样貌和生活情景，投射出“变革”在城市市民群体中的“浮躁”化窘状及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深刻影响。

“文革”乃至改革开放后，变革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均呈现出“除旧求新－破坏丢失”的总体走势。剪子巷这一文化场域因文化惰性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相关文化载体（如古籍、古画等），但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剪子巷接连经历两次文化清洗，并在第二次文化清洗中遭到了致命打击。第一次“除旧求新”打着“破四旧”的旗号。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破四旧”定义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7]](#footnote-6)]，然而激进青年却把这一口号简单化为对物质形态的“四旧”进行一刀切的破坏，剪子巷的古字画、瓷器、陶器等优秀传统文化载体，随着“二十四孝”、镇宅灵符等文化糟粕一并被消灭了。戏剧性的是，作为“小头头”的魏青山在声势浩大的破坏之后仍是跪倒在“上人”面前，剪子巷真正的封建余孽——等级制仍没有动摇，这场以“除旧求新”为目的的改革最后仍是以破坏和混乱收场。第二次文化清洗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市场”被迎进了新时代，“让各色人等在里面翻跟头”[[[8]](#footnote-7)]。历史有了新的价值——换钱。城建局计划将剪子巷拆掉重建一条仿古商业街，拥有文化底蕴的古建筑比不上具有商业价值的仿古建筑，“市场”这个厉害角色直接将剪子巷的踪迹样貌统统抹去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一起翻浪的还有早被废除的封建糟粕。在市场需求下，“万花楼”出现了现代版本——“理发店”“洗脚房”，吕阿姨不堪回首的过往经历竟使她成为某些人眼中的“顾问”；八爷与丫头私通，还振振有词，认为“别人家有钱去投资房地产，我不过投资生一个儿子”[[[9]](#footnote-8)]，早已被废除的三妻四妾的封建传统竟在市场规则下重新站住了脚跟。纵使“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改变，但深藏在中国人人性深处的等级制度仍无动摇，只是划分等级的标准由政治身份变为金钱，这两次改革都像“猴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10]](#footnote-9)]。

在《明天有多远》中，袁劲梅感叹道：“地球转了一圈，路又走回去了。”[[[11]](#footnote-10)]一系列变革由狂热的“求新”情绪推动，不但在破坏中丢失了传统文化底蕴，还最终以混乱和无效收场。

#### 2.2 暴力战争的“疯狂”

正如袁劲梅在采访中所谈，“人类历史上每一阶段的文化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文明”和“野蛮” 的争执中发展的”[[[12]](#footnote-11)]。她也注重在作品中呈现“文明”与“野蛮”在特殊历史阶段中的斗争与拉扯。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与《疯狂的榛子》中，袁劲梅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文革”时期与战争时期的“野蛮”与“疯狂”，并运用生物学、心理学知识寻找暴力发生的根源与过程中的催化剂，悲悯暴力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深刻印痕。

**2.2.1 “恶何以滋生”**

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别。”[[[13]](#footnote-12)]袁劲梅在作品中展现了兽性在暴力运动中的支配性影响。《青门里志》中她独具匠心地设置了独立于故事之外的《科安农-苏邺风动物观察日记》，其中描绘的动物行为又与每一章节的情节发展相对应，使读者自然地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探究其相似性。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两种族群，同为人类祖先，二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和性格特征：黑猩猩家族有着严格的等级制，缺少亲缘观念，嗜血暴虐，贪婪冷漠；博诺波猿奉行爱的政治，以食物团结群体，以性爱解决争端，平静和谐，充满温情。这两种特征都在人的身上得到了复现，袁劲梅采取对照的方式，分析“文革”时期人民的暴虐和嗜杀。皮旦是文中着力书写的一个角色，她“小细腰，小黑脸，尖下巴，单眼皮，嘴唇是紫薇花的颜色，立体的......像从后院子爬到前院子来的丝瓜藤子”[[[14]](#footnote-13)]，外貌美好柔弱的她却慢慢变得嗜血暴力，杀兔子、打人致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她丢掉了人性深处的善良和不忍，毫无心理负担地加入了野兽之列。袁劲梅感叹道道“人虽然生得好好的，可一不小心滑了一跤，就返祖了。”[[[15]](#footnote-14)]

诚然人性中残留的兽性是造成暴力斗争的根本性原因，但袁劲梅也敏锐地察觉到“极左”思潮带来的裹挟性力量，即群体性行为的无理与疯狂，她的文本中透露出清晰的群体心理学理论痕迹。著明的心理学家勒庞心理学说中的“群体”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所有人的情感和想法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个体特点的集体思维，勒庞将其称为“一个心理群体”。[[[16]](#footnote-15)]袁劲梅笔下的故事便发生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课堂内孩子们学习的是革命文化，课堂外随处可见可闻的标语口号也让他们耳濡目染，最终使得孩子们“开口闭口说‘枪毙’”。在畸形的“极左”文化空气里大多数人都受了造反的蛊惑。

《青门里志》中的红卫兵便是一个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群体，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把人裹挟到一起的力量。袁劲梅借“小苏邺风”的视角描述这种群体效应：“他们要是一个一个来，也就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聚到一起，成了群，就成红卫兵了。”[[[17]](#footnote-16)]红卫兵这个组织相较于个体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将政治话语引申得贴合群体心理，并将其作为一种宗教深信不疑，其狂热的宗教情绪在具体的事件中往往表现为生物本能的暴躁、残忍，他们不具备思考的能力，通过断言、重复的方式说服其他人，而个体一旦陷入到群体主义中，往往易于被言语和形象所影响，并不考虑行为后果和所应担负的责任。在群体丧失理性的条件下，红卫兵们抄家、游街、虐杀兔子、将人殴打致死，在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中，“我们看到有意识的个性的消失，无意识的个性的得势，思想和感情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而指向相同的方向，在一瞬间将被暗示的想法转变为行动的倾向”[[[18]](#footnote-17)]。红卫兵在行动之前必喊口号，如批斗伽伽贝贝前，他们先是唱了一首节奏性很强的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你就站出来，不革命的滚，滚，滚，滚他妈的蛋”[[[19]](#footnote-18)]，证明批斗的正当性；红卫兵怂恿皮旦虐杀兔子时，又喊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杀杀杀！”“忠不忠，看行动！”[[[20]](#footnote-19)]于是皮旦就在这种“断言”式的口号下砍出第一刀，其他红卫兵们为了被认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一人一刀将兔子凌迟致死。红卫兵们在此次事件中所展现的感情简单而夸张，近似于原始生物扑杀猎物时的征服欲和虐杀欲，群体理性缺失之害尽显无遗。在红卫兵的示范下，青门里的孩子们也无力抵抗群体力量的裹挟，他们失去了家长权威的约束，面容还很稚嫩天真，嘴里却吐出脏话，还扣父母辈肚脐眼、坑害敬爱的陈爷爷，他们将基本的亲情与尊重抛在脑后，儿童的堕落是“极左”时代语境下的最大恶果。

兽性与群体无理性将人类社会推向罪恶与野蛮，而袁劲梅借书中陈爷爷之口暗示了解决方案。“两匹马，一个驭手。一匹好马......追求真理、人格和光荣，不需要鞭策，另一匹坏马黑色......满身兽性，要不停的鞭打，才能跟着白马拉着车子向前跑。所以，驭手只能是理性。驾驭好马，管住坏马。”[[[21]](#footnote-20)]人性的善恶犹如两马并驾齐驱，袁劲梅借此文呼唤理性的回归，守望人性之善。在她看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以此对抗“平庸之恶”。

**2.2.2 悲悯人性创伤**

从“暴力革命与战争”中走来，袁劲梅又意识到一个问题：特殊的环境不允许人们有思考的能力。在《疯狂的榛子》中，我们可以发现袁劲梅的无奈，她描绘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理性思考后的战士们心灵的分裂。范笳河是中美联合空军的一名军人。他认为：“战争是最没有逻辑的事，是疯子发动的，我打这场战争的唯一逻辑就是：给和平争取最后的机会。”[[[22]](#footnote-21)]但是在野蛮的暴力中，范笳河仍想想保留住自己的人性，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我”的理解与认识，而这也是绝大数军人的相同的心理体验。文中描写道：“当航空兵开起枪或扔起炸弹来，我们常常觉得周围的世界不是真的。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得承受，都得去做……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清净人，谁也别想碰他。”[[[23]](#footnote-22)]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参战者呈现出某种自我分裂的心理状态。当一切服从于战争伦理时，军人的身份使其必须剥夺他者的生命，但作为人类的伦理却使他们在开枪时产生强烈的愧疚，他们只能将自己强行分裂，并说服自己为正义而战，为“正常的生活”而战。但即使是正义战争，好的是“正义”，而非“战争”。战争的邪恶本质将一个正常的人扭曲成一个杀人机器，理性思考下的“好”我只能屈居一旁。另外，在《青门里志》中，呈现出名为“沉默的螺旋”的心理现象。在袁劲梅看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他就不太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被多数人孤立。《青门里志》中，“我”妈进京告御状被抓之后，突然发现怎么周围都是人民群众？难道‘邪恶’悬在空中？她模模糊糊地摸到了“邪恶”的真相，但她也觉察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环境”冲突，于是转而闭口不言。正如陈爷爷所说：“沉默是最糟糕的。荒诞，是从世界不理智的沉默中产生的。要是所有真理都沉默了，那真理就染上了毒素。”[[[24]](#footnote-23)]历经批斗、打骂之后的青门里文人终于开始独立思考，却发现真理是不允许被宣之于口的，他们只能谨慎地在真理与假象的夹缝中生存，舆论导向被不理智的群体所掌控，社会思想愈发朝向极端化发展。

战争对人的伤害并不仅仅只有肉体上的伤痛，战争的状态与伦理给军人的神经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即使在和平年代、正常社会，军人遭遇过的战争还是会在精神上回返。袁劲梅不满足于描写残酷的战争场面，她借用现代心理学病症——PTSD来间接表现战争的残酷，展现了宏大叙事与个体境遇之间的巧妙融合。 PTSD 也即 “灾难压力后心理紊乱”，是病人经历或目睹重大灾难过后，在心中留下的深深的伤痕。《疯狂的榛子》中的沙顿少校是一名服役十二年之久的军官，明明是在好端端的和平时期，他却因为听到飞机的声音“突然就像上了弹簧，一下就跳到公路边的沟里，卧倒了。”[[[25]](#footnote-24)]心理医生给他的诊断是：“你的毛病在于你十二年的军事生活……那一套在那样的制度下生活的生存密码，已经打在你的神经末梢上，成了你的第二天性了。”[[[26]](#footnote-25)]由于十二年军队生涯，少校沙顿难以融入平民世界，战争虽然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但其影响确是残酷而深刻的，正常人性状态在战争中的扭曲异化与分裂，是战争留下的永久伤痕。

袁劲梅从生命个体及其经历的暴力革命与战争悲剧出发，关怀具体的人的心灵创伤。当走过暴力运动和战争之后，如何保留“疯狂”后得来的不易的和平？她强调，“别当‘角色面具’当到忘记了当那个核心的‘人’”[[[27]](#footnote-26)]。而体现在当代社会，则是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出她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理性思考的重视，以及对暴力的抵制、对和平的呼唤。

### 第3章 睿智洞达的文化透视

历史的迷雾既已拨开，袁劲梅深入到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走向未来的答案。无论是早期《月过女墙》中对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探讨，还是《忠臣逆子》 中篇小说系列在差异视野中揭露传统文化劣根，或是《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中由历史反思上升到文化透视，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文化反思主题的一脉相承。她继承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大力批判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等级制和边缘乡村的文化陋俗。同时，以中西对比视角展现中西文化在政治观念、对于爱情的态度以及家庭伦理等存在的差异。最后，袁劲梅在跨文化背景中提出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即“拆了横在东西文化之间的墙, 把那共同的人性之美当作一片红叶”[[[28]](#footnote-27)]，以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融合西方文化的现代理性，最终实现人性的和谐与美好。

#### 3.1 传统文化的深入呈现

《青门里志》开篇引用了易卜生的名言——“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点出了全民族对于这一段特殊历史的责任，而从农耕文明走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造就民族性格的根底。“人们深深地受着文化模式的约束却又不觉得有什么约束；文化势力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人们却不觉得有什么压力。”[[[29]](#footnote-28)]在袁劲梅笔下，中国文化是一个受儒家学说渗透的“文化磁力场”，每一个落进这磁力场的人（甚至包含个别外国人），都不得不按照这磁力场的运行规则行事。人们身上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在三千年约定俗成的文化规则下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即使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骨子里仍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印记，他们对世界的乱象感到疑惑却无力探寻原因，而袁劲梅像“进入另一池水的鱼”，在冷静回顾中国的历史事件后发现了自秦汉形成的文化基因的决定性作用。她在作品中从“忠、孝”两方面展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印痕，以及国人在这套社会规则下被压抑甚至被吞噬的惨状，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痼疾。

首先，儒家学说从“仁”的思想体系中，阐发出对“君子”的第一个要求，即“忠”。“忠”意味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民“在其位、谋其事、守其礼”，由此形成了一张等级森严的社会大网，每个十字交叉口镶嵌着一个社会位置。封建等级制对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影响最深远，它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传统的小农经济确立了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形成了以男性为尊的宗族家长制度。儒家学说又从家族中的血缘伦理关系出发，推演出一套上下尊卑有别的伦理关系，中国由此变成了由小家庭单位联结而成的大家庭，等级制成了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袁劲梅将小说的时间背景设置在晚清到改革开放后，这个历史时段是中国最为动荡、变革程度最大的时期，而袁劲梅发现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人们的思想状态、生活条件、精神追求甚至对另一半的要求都有了全新的改变，但是封建等级制却深植在社会规则的框架里面，近百年的文化改革都未能动摇其根本，新的时代依然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上。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在《青门里志》中最明显，无论是先进知识分子还是传统市民阶层，人们都像螺丝钉一样心甘情愿地被安放在某个位置。 “我”妈以差点付出生命为代价，却还没有唤醒自己的独立意识，始终以“维护圣事”为天职；魏青山跪倒在“上人”老太爷面前，得了一句“还没成人，便想成种”的评价；小铜匠疯了之后仍不忘称自己为“奴才”，“听话”和“效忠”早已印刻在其潜意识的最深处。在等级制的游戏规则中，“种属”“政治”“金钱”都成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人也由此被划分为三六九等。“种属”和“政治”的等级标准是小说中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王教授与俄国人柳丽娜的爱情从被看好到被鄙弃，只是源于中俄关系的恶化。他们的孩子因不是“纯种”而低人一等，伽伽与红鸟的爱情也因为家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而无法获得祝福。《疯狂的榛子》中，范笳河也在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中与爱人划清界限。在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划分等级的标准，“名牌”服装成了人们身份的象征，道德要求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划分等级的标准随着时代变迁，但等级制规则在次次变革中“岿然不动”，爱情、人性、道德都要为等级让步，人的价值和意义在等级制中被无限忽略。另外，袁劲梅还在文中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在西方文化体系下长大的“科安农”这一形象，映照出西方民主、平等思想教育对人性健康发育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反衬出中国传统等级思想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

其次，“孝为仁之本”，在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中，“孝"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思想内涵生发出宗族等级制。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说来，就是归顺与服从长辈的意思，确定了在封建宗族中长辈的绝对权威。袁劲梅在小说中刻画了在这种孝文化影响下，家长所特有的权力与臣服于这种权力之下的晚辈们的痛苦遭遇，格外可悲的是往日的晚辈成为今日的父辈，愚孝文化生生不息。在《老康的哲学》中，袁劲梅借老康之口讲了一个惨无人道的故事。老康所在的宗族是以在船上唱戏为生的，爷爷作为一家之主具有绝对权威，某次因唱戏没唱好，老康爷爷大发雷霆，四个儿子便全部跪下，心甘情愿地挨打，打完后儿子们还要切了红壤西瓜给老人家消消火。然而老康爷爷余怒未消，老康爸爸便打起自己的三个求情的儿女，“最后，把老康二姐手脚绑起，扔下运河，才平了一场社会怨恨......结果，二十年后，那个踢着两只脚腕游到岸边的二姐倒是康家最孝顺的后人。”[[[30]](#footnote-29)]这一情节读来让人不禁疑惑，到底是什么样的“孝”会使家庭中具有亲缘关系的父子产生如此大的恨？而以一个生命为代价去平息上一代的怒火，难道是一种“孝”吗？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的“二姐”，竟还不能脱离“孝”的挟制，足以见得愚孝文化在人们心灵中强大的渗透作用，简直是刻画于灵魂的潜意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孝道”建立“爱”的基础上，而封建愚孝则是以打压、剥夺下一代来确立自己的权威，没有感情的“孝”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在另一处地域——范水，袁劲梅讲述了一种愚昧可笑的宗族习俗，揭露出愚孝文化的荒唐。范水的孝子行的是“大孝”：“一家的长子要能把自己的新婚媳妇让出去，给爹爹享用，还高高兴兴，这才叫‘孝’。”[[[31]](#footnote-30)]在这种愚孝习俗的影响下，范白苹的爷爷刚结婚就进山，将新媳妇留在家里，方便太爷爷“大补一回”。范白苹爷爷几次想冲回家去，但通通忍了下来，因为范水奉行“能忍，才叫孝”的理念。范水的孝文化扼杀掉一个18岁青年的合理性欲望，从成年成家开始，范白苹爷爷的反抗意识就被如此磨灭，此后一步步都在父权结构中萎缩，直至自己接手父权，悲剧循环往复，被恶龙欺压的人终成恶龙。袁劲梅道出这一荒唐行为的本质，“范太爷并不是一定要睡新媳妇......范太爷要的是儿子能显孝顺，这是他在范家地位的保证。”[[[32]](#footnote-31)]无限打压子孙辈，只为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动摇，愚孝习俗打造出无限服从父权和皇权的“奴隶”。当然也有产生反抗意识的后代，《罗坎村》中的罗青浏不接受“子为父隐”的价值观念，认为自己替父受过是不公平的，但是他的反抗先是招来父亲的当众打骂，接着又遭受了村民的共同指责。可以说，当愚孝文化变成一种社会规则时，整个社会的人不会容许哪怕是一个小孩的越矩，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的火种没有燃起的希望。

袁劲梅还关注在封建等级制和孝文化中女性的命运遭际。在父权社会结构中，男尊女卑似乎是天地之义，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出生到老去，女子一直属于从属地位，没有选择权的她们在宗法社会结构中人性被压抑，作为人的个体价值被隐匿。同样在范水，愚孝文化剥削子辈，但子辈还不是完全的牺牲，他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而“范奶奶”才是宗法制度和愚孝文化真正的牺牲品。“她的感觉，在男人们的图纸里从来没写过。或者，写了又被删掉也有可能。”[[[33]](#footnote-32)]在封建宗法制度里，女性是生育工具，是权力的垫脚石，可就不是人。在《忠臣逆子》中，袁劲梅描写了一名妄图当“人”的可怜女人——艳芸。艳芸悲惨人生要从“三从”规则说起。她在极小的时候就被作为“童养媳”接去戴家大宅院里，可是丈夫却是接受了新文化的新人，从不回乡下老家，而老宅院里的七姑姑八爷爷，无一不监视着她，并以“守节”习俗约束她，甚至作为一名守活寡的女人她的快乐都是不该的。可是她也渴望关怀渴望爱情，在偷情中她的肚子慢慢变大，招致了全宅院的打骂，最终连她倾心的人都来打她以证清白，艳芸终于失望了，在不见天日的大宅院里吞烟土自尽，艳芸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三从四德”是宗法制度强加给女性的评价标准，在此之外女性的欲望都是不合理的，一旦超过这套价值标准，全社会的人都要消除这个异类。袁劲梅感叹道：“那样的宗法等级制是明着要一半的人当牺牲的。”[[[34]](#footnote-33)]

袁劲梅对于浸透中国至深的儒家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不可否认，等级制的存在是中国三千年生存智慧的一个侧面，但袁劲梅揭露了等级制的本质，即“谁弱小就吃谁”的残酷社会伦理，类似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在她看来，我们从“丛林”中走来，但不能把丛林规则带到文明社会，“‘文明’是对人性中那一点和盲目的动物性不同的东西的尊重”[[[35]](#footnote-34)]。通过呈现文化痼疾，她实际上在质疑封建传统文化对于人性的泯灭，再次强调尊重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关怀。另一方面，袁劲梅并非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她客观地承认，“哪国的文人也没有我们中国的文人投入。有这样的文人，是中国的福气，也是中国的悲剧。”[[[36]](#footnote-35)]文人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同样也是“忠”思想发展而来，她意在提醒“弘毅”的知识分子们，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 3.2 差异视野中的中西文化

袁劲梅深深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她又以开放的心态，在宏阔的视野中感受着中西文化在政治生活、爱情观念、家庭伦理中的不同。她在《九九归原》中谈到：“我们这些在美国读了书，又在美国工作了的中国人，像嫁出去的女儿，见一点人家好东西都想拿到娘家来用。”[[[37]](#footnote-36)]她自觉地站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以自己的小说为实验文本，以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实验对象，在对比中发掘西方文化的精华，寻找适合中国的普世化道路。

《九九归原》可以说是她的作品中中西文化对比最鲜明的一篇，在创作谈中她直言道：“我写这个故事，是想借助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作镜子，来看看我们的民族劣根性。”[[[38]](#footnote-37)]她毫不隐藏自己的对比意图，《九九归原》一共五个章节，标题便是“第一面哈哈镜”到“最后一面哈哈镜”，提醒着读者要以对比的眼光进行阅读。每一章节的小标题又以“圈子内”“圈子外”“小圈子”直接划分中西方学者的阵营，彰显中西文化对比的视角。

文中主人公“戴教授”与她的朋友们都是在中国接受系统教育后来到美国的，试图融入西方文化场域的他们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表现出来的却只是浮于表面的行为方式，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却被扔在一旁。袁劲梅在文中描绘了两个“小圈子里的民主运动”，一是戴教授所在大学哲学系面向社会选出一位“终身系列教授”，二是她所在的华美哲学会搞主席团换届选举。作为两个活动的参与者，“戴教授”获得的对比感尤为强烈。在大学哲学系，戴教授组成三人调查团根据全系讨论好的“单子”为应聘者打分，在全系讨论时还要应对其他教授的审查与提问，戴教授敏锐地察觉到，原来自己得到的只是权力的使用权而非权力本身。而在华美哲学会的换届选举中，戴教授先是被杨纠要求投他一票，后又被其拉拢进新成立的“亚美哲学会”，统共30多名在美学者，硬是为了争夺权力分裂成两个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汲汲追求更显示了民主的失败。西方的文化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中国文化的带病基因，也映出了中国学者既丢弃了农民的质朴，又没能将西方真正的文明果实引入自己的文化的错误行为，在显著的对比中深刻的哲理便自然生发出来。袁劲梅无奈道，“‘德先生’进了中国，在中国也坐不住。我们文化里没有他们的位置。”[[[39]](#footnote-38)]

关于爱情与自由，中西两类人群也有不同的认识与选择。《九九归原》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搞“婚外情”“忘年恋”，他们年轻时没有多少婚前的自由选择，中年获得地位后又对爱情蠢蠢欲动起来，但这种蠢蠢欲动却是以欺骗为前提、以不影响名声地位为底线的，对他们而言，老殷博士的离婚就是惊天动地的人性解放了。接着，袁劲梅转而描绘了学生们的“三角恋”。小风车在有男友的情况下通过一次突发事件爱上了克瑞斯，而她要做的是第一时间告诉男友，而克瑞斯也表示，小风车有男朋友，自己有自己的恋爱原则。小风车的男朋友得知后表示虽然难过，但是他会尊重小风车的爱情选择。最后，小风车依然选择和男友在一起，他们三人仍然是好朋友。和教授们的恋爱相比较，学生的三角恋似乎是那样的简单明了，爱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社会契约，而是一种个人选择，他们将人性置于首位，恋爱无关道德。

中西在教育上的观念也有很大不同。《老康的哲学》中，老康鼓励“割韭菜”式教育，“教育小孩子就要像割草。进来的时候高矮胖瘦，给他们全球统一教材，让他们参加世界统一考试，发统一校服，配统一眼镜，一律双语教学。这样一路割来，十年出来的就是一片平展展的绿草地。教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40]](#footnote-39)]。这种功利化、实用性教育观念反映出袁劲梅对我国浮躁化的教育风气的不认同，受“大一统”式的传统教育理念影响, 孩子们被培养成一个样，勤劳、听话、整齐划一，人性在教育领域也被压抑。《罗坎村》中的“石壕吏”坚守着“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他把自己评上“正研”职衔的经历当作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还教育孩子研究恐龙没用，要好好学习走上仕途。这种为了“未来”而学习的教育理念无疑压制了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文中，袁近梅也描绘了美国的教育方式。在她笔下，美国小学采取尊重孩子个性发展与兴趣爱好的培养方式，鼓励孩子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注重引导孩子养成思索的习惯和学习的方法，而并不重视给孩子灌输很多知识。在中西对比中，袁近梅充分肯定了美国的教育方式,而中国浮躁、功利的教育观则遭到袁劲梅无情的嘲讽。

由于去国离乡几十年，在大洋彼岸的袁劲梅无法实时获得现代化中国的文化发展情况。实际上，当今中国文化愈发先进开放，教育培养方式也愈加科学合理，所以其书写的关于中西文化在政治生活、爱情观念以及教育伦理上的不同，实际上存在理念固化的局限性。不过，袁劲梅的书写仍有提醒的价值，防止某些方面的过度统一化。

#### 3.3 文化融合之路

袁劲梅承认中美两国文化存在差异，但并不认为二者有高低之分。早在小说集《月过女墙》中，袁劲梅就表露了对中国古朴、自然文明的热爱，但是现代化进程过于浮躁，人们还没来得及保存文化之美，就陷入追求经济发展、盲目学习西方技术，致使文明失落的困境中。她认为文化融合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把自己融到人家里面，自己的文化就没有了。一种是把人家的好东西融到自己身上来，自己还是自己的。”[[[41]](#footnote-40)]中西文化各有优点且各有缺点，所以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二者在融合的过程中互相汲取好的因素，从而集聚成一种更优秀的文化。

首先，袁劲梅分析了追求美国梦而放弃自身文化的可怕之处。在她笔下，许多人盲目向往美国的新鲜文化，反而置自己于悲惨的境地。如《葫芦花》里的葫芦花和《萝芙镇的吉茜》中的吉茜，本来天真烂漫的她们有自己幸福的生活，但她们意识不到乡村生活的珍贵，怀着躁动的心去了西边的世界，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是天堂。《葫芦花》一文中，袁劲梅将乡村生活与美国文明并置，代表美国文明的刘先生没有“人味儿”，每日过着程式化的生活，而中国乡村却充满温情、淳朴和热烈的原始生命力。于是葫芦花开始怀念起家乡的黑豆儿，怀念直接和热烈的爱，可是葫芦花早已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下丢掉了自己的真诚与原则，她带着偷情而生的儿子回到家乡，却发现旧时的乡村已容不下她了，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那看似寻常却珍贵无比的美好文化。在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中，袁劲梅大力肯定了中国的古朴文明。《萝芙镇的吉茜》也是如此。吉茜是罗芙镇出了名的美丽姑娘，她与小药师是村民们都看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幸福的生活还没多久，吉茜在表舅朋友的挑唆下，拿了一大笔钱打算去他口中的美丽天国。然而，现实却是无比的残酷，她先是被安排在一条破船上偷渡美国，后又被关在阴暗的小木屋里，遭受了残酷的打骂和强奸。而小药师为了帮助他的爱人，不断去借钱，甚至卖肾筹钱，最后在病死之际才得知他的爱人吃尽了苦。小药师终于痛苦的死去，而吉茜也在巨大的身心折磨下绝望。《黄藤酒》中的世德为了治好妻子的绝症，去往异国拼命赚钱，可当他终于带着钱回家时，妻子却已经离开人世了……袁劲梅这些故事无疑在提醒我们，美国人的现代化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自家文化的温情、淳朴才是我们更应该铭记的东西。

其次，袁劲梅肯定东方文明中淳朴原始之爱的力量，认为这是修复现代文明病的有效方式。她说：“我故事里的朋友们，就像是一把种子，他们从一个深沉的文化里走出来......他们的文化底蕴远比美国文化深厚，他们的人生观是经过苦难后的平静思考，他们保留着东方价值恰恰是西方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良药。”[[[42]](#footnote-41)]随着现代文明在发展，许多文明病和社会病不请自来，它们将人变成社会的工具，从而使人在机械的运转中越发冷酷、麻木，而爱的力量与原始自然的温情则是其“良药”。在《病毒—— —未来犯罪实录》中杰笙听到儿子心脏跳动的声音，才放下仇恨重拾人性；《绿豆儿》中的绿豆儿明知命不久矣，却仍以爱意和善意温暖朋友和家人；《野狗的父亲》中，父亲最后终于懂得以父爱来呵护孩子的成长之路；《胡天八月》中，中国文化精神化为动人的音乐，使礼查的心灵获得了满足。同样，《道之动》的桑果儿在经历了自我迷失、 异化后，最终回到了乡村，也正因此得到了人性的回归。

在袁劲梅看来，东西文化的差异像一堵墙，唯有拆除这堵墙，文化才能达到融合与和谐。但同时她也指出，拆除这堵墙我们必须以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取外国文化中科学合理的因素。袁劲梅期盼以道家的古朴、自然拯救现代文明，只是这一改良思路在当代社会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还是未知。不过，在《水母》一篇中，袁劲梅表达了对于文化融合的希望：“也许，在那里有一种挣扎，落日正在一个分裂的界线上孕育着明天的力量。”[[[43]](#footnote-42)]

### 第4章 启蒙主义映照下的国民性批判

袁劲梅对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与批判，展现了其对知识分子情怀的坚守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不禁回忆起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一代人的启蒙主义写作。在新时期，袁劲梅展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关切，她一方面揭露国民在三千年文化磁场中形成的思想的麻木和精神的奴性，另一方面又结合建国以来的具体社会事件，分析国民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新特点，其笔触深刻而又冷酷，体现了鲜明的国民性批判指向。

#### 4.1 思想的麻木

五四时期，鲁迅曾以深刻的笔触控诉过“中庸”给国民带来的影响，“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到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44]](#footnote-43)]在鲁迅看来，国人的圆滑与思想的麻木皆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不过，中庸思想最初是用以教导人们行为要适宜，做人要不偏不倚，避免“过犹不及”，是一种中性的思想品质。但流传到后世的“中庸”，被人们所看重的却是其实用价值，即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例如“枪打出头鸟”“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俗语，都是人民对这种生存智慧的注解。于是，这在种思想影响下，人们逐渐不思进取，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袁劲梅笔下也展现出在中庸思想影响下，我国国民思想的惰性和麻木。在她看来，这也是致使百年来的变革无法深入到民众中去，从而产生变革“怪圈”的一大原因。

袁劲梅笔下有这么一群小市民，他们过着安分守己的小日子，置身于社会的动荡之外，展现出冷漠麻木的明哲保身意识及“惰性”心理。在《青门里志》中，袁劲梅描绘了市民文化场域——剪子巷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中的状态。剪子巷的老魏可是真正的“人民”，在他看来，青门里文人的反抗是“傻”的表现，认为“人装一下样子，服个软，什么都能过去”“革命是文人闹出来的事。破他们，破不到我们。”[[[45]](#footnote-44)]这种侥幸的心理带来的却是大规模的文化清洗和批斗。在这场混乱中，另一个小市民八婶子不关心会带来什么损失，也不在乎变革的内容，她关心的竟然是晚上还能不能打麻将。悲哀的是，这场以文化糟粕大清缴和两个鲜活生命收场的清洗与批斗也没有换来市民们的思考。不久后剪子巷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中，八爷总结道：“外面那些闹事的，壮观！管到四海五洲去了。他妈的，与我何干？什么都是假的，好日子才是真的。”[[[46]](#footnote-45)]过了些时候，八爷开始摆弄小碎砖，企图再磨一副麻将牌，世外桃源般的剪子巷又回来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运动也不过是往平民生活里丢了个小石子，几圈涟漪过后，风平浪静。封建时代的中庸思想帮助人民在朝代更迭中继续过平稳的生活，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中庸思想演变而成的惰性心理仍在发挥效力，人民不关心社会的变革，不进行独立思考，在麻木中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然而，这种麻木最终却是会导向灭亡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展风采，剪子巷面临着拆掉以重建仿古民居的困境，这一次，老魏试图改变了，然而为时已晚，剪子巷和其人民终究是在麻木中落后于时代大潮了。

袁劲梅在访谈中曾讲过柏拉图的“洞穴”故事：“‘哲学王’走出了洞穴，看到了真理的光。他回到洞里，告诉洞里的人：墙上的那些影子是假象，光在外面。可没人相信他，反而打他骂他。”[[[47]](#footnote-46)]《忠臣逆子》中戴家老宅的“七姑姑八爷爷”就是一群在“忠、孝、仁、义、信”的“洞穴”规则中生活的人，他们盲目地追随着和传承着这一规训，不允许任何人越界。当艳芸在人性欲望的驱使下怀孕之时，他们便声讨艳芸破坏家训，必须严惩。这时，从戈壁沙滩来的“奶奶”像“哲学王”一样站了出来，她喝道：“皇帝都推翻了，家训还不能改吗？！”然而他们麻木封闭的内心竟没有泛起一丝涟漪，他们一听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他们战战兢兢的仿佛天塌下来了。国人思想的麻木使其忘记了独立思考的的重要性，三千年来传统文化的规训已经被印刻 到国人本能里。袁劲梅无奈地发现，文化惰性不是一句“真理”便能消除的。

传统文化是一种磁场，具有极强的裹挟力与同化力，每个身处文化磁场的人必须遵循它的规则和逻辑，待得久了人也沾染上文化的惰性，并表现出思想上的麻木和行为上的规训。袁劲梅写作的意图便像“哲学王”一样，她是那个走出“山洞”的人，寻到真理后她坚定地返回，大声喊道：“人也可以换一种活法！”

#### 4.2 精神的奴性

我国的传统文化以“礼治”为核心，它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而成就了“等级制”的不败地位。我国国民长期受制于等级制“尊卑长幼”的规训，行为和精神上都已留下“奴性”的深刻印痕。梁启超认为，国民的奴性分为“身奴”与“心奴”，“身奴”大致是传统意义上的奴隶，而“心奴”则指人的精神依赖。在袁劲梅的作品中，国民的“心奴”是她的主要呈现对象，她不仅批判了国民对“权威”自始至终的顺从，还揭露了在改革开放后，国民“奴性”的新特点，即对“金钱”“权力”的依附，大力挖掘国民精神的“奴性”之根。

**4.2.1 对“权威”的盲从**

20世纪以来的百年中国正是变化跌宕最激烈的一年，在政治上，“皇权”被打倒、民主被迎进；在文化上知识分子被改造、“红五类”被抬高；在经济上，我们大跃进大生产，开展“市场经济”。人们似乎是被时代大潮拽着前进，然而却展现出了无比的顺从，在他们眼中，“权威”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人多的那方，但总之不是自己。他们绝大多数丧失了个体思考的能力，主动将个体特性抹除，无条件地适应社会的规则，展现出对“权威”的盲从。

袁劲梅笔下有三类顺从“权威”的人。第一类是高级知识分子，出于对信仰的坚持和“忠君爱国”的君子之风的坚守，他们有意识地改造自己融于集体中。在《忠臣逆子》中就有这样一群文人。“我”的父亲为了寻求政治身份的认同，摆脱“剥削阶级”身份，他将戴家的地契和房契一股脑儿烧掉，并自愿与地主出身的奶奶保持距离。而且，甚至因为自己的不好出身，他认为自己不配和工人阶级竞争爱情。将爱情也划进阶级斗争中，就意味着人性的压抑，可是父亲自觉服从“信仰”和政策，其欲望和渴求皆自愿被困在“奴性”之内。《青门里志》中“我”妈也是具有“革命信仰”的一类文人，她始终认为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当被批斗致伤差点致死时，她仍未能醒悟，待身体好一些便“上京进谏”去了，然而一无所获。《明天有多远》中的文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反腐败、去陋习，被当成地下党抓起来也毫无怨言，好不容易在长辈的疏通下逃出监狱，却又因为“没有牺牲就是叛徒”的革命理念，再被抓入共产党监狱。袁劲梅感叹道：“我妈那代人的毛病是：离了组织和权威就不知道怎么活了......人活得很大，却找不到自己。”[[[48]](#footnote-47)]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将自己融进集体中，于是锻造自己不合适的边边角角，甚至连人情亲情都可以置之度外，人性的丧失在“文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类人是在“文革”年代长大的儿童。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在社会氛围影响下，无意识地将“奴性”融于人格中，在社会教育与人性本真的冲突与矛盾中，呈现出人格分裂的现象。《青门里志》中年仅七岁的“小苏邺风”便是如此，她在童真与迎合社会间反复挣扎，服从权威与本真人格产生巨大的冲突，使她呈现出人格分裂的特征。她爱的长辈们如陈爷爷、父母、燕吟爸爸等都是被集体批判的对象，在红色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她伤害了自己爱的人，做出了失去理智的事，她一方面觉得理所当然，仿佛这就是社会的法则，另一方面内心又感到疑惑和痛苦。袁劲梅在文中设置的婴儿“安无为”形象别有意味。“小苏邺风”每当做出违背善良本性的事之后，就要回到“安无为”身边，不断地说“安无为”有多可爱，自己有多喜欢“安无为”。可以说，安无为是她的“童话”，也是她对抗迫害人性的社会的退守之地。

第三类人是普通小市民，在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奴性早已成为其潜意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自觉接受命令，本真人格已经退缩到虚无之地。在《青门里志》中，袁劲梅刻画了小铜匠这一人物。小铜匠日日在青门里街口修补铜器，对于前朝国事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自认为是良民一个，可是在那个时代因为祖先的问题，入了地主富农坏分子类，被吓疯了的他，口中仍混乱地喊着革命和效忠，“听话就没事，社稷为大”“圣旨说‘造反有理’，哪个奴才也不甘落后”[[[49]](#footnote-48)]。他所戴的面具要求他做一个“听话的奴才”，而新形势又让人“造反”，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足以使他精神崩溃。再如《疯狂的榛子》中的莫兴歌，自小开始的看守所经历，使他养成了一张“公家脸”，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表现出对政治的敏感，时刻准备着进行阶级斗争，屡次在“誓师大会”上展露媚上丑态，在他心里，集体、阶级、人民大过一切，而其个体价值则在集体社会面前被泯灭。

梁启超曾感叹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50]](#footnote-49)]袁劲梅以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挖掘“文革”时期国民盲从于“权威”的性格特质。在她看来，“奴性”不但导致了个体声音在集体里的消失，还间接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

**4.2.2对“金钱”的依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一味地追逐物质享受，展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在新的历史阶段，国民的“奴性”有了新的对象。人们在追求各种现实利益的过程中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他们被贪欲驱使着前进，逐渐丢掉了家园情怀和真挚的情感，袁劲梅在小说中花大篇幅描绘了这类成为金钱奴隶的当代中国人。

首先，在金钱的诱惑下，人们怀着对物质生活的向往纷纷前往城市，旧有的美好家园却被人们遗忘。袁劲梅笔下的罗坎村虽然存在传统文化痼疾，但也称得上是乡情纯朴、邻里和谐的的家园；可人们对于金钱的渴望使他们背井离乡，村子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困境，几乎成了弱势群体的留守地。不但如此，家园的生态环境也要给“金钱”让位。为了建大坝发电挣钱，“涓泉已成了巨大的垃圾堆，人造垃圾和废物张牙舞爪，赤裸裸地、不知羞耻地压在涓泉上......色彩斑驳的龙王宝座远远地扔在垃圾堆边缘……”[[[51]](#footnote-50)]在金钱面前，充满温情的家园不得不败下阵来，被时代和它的乡民们抛弃。

其次，在“金钱”的奴役下，人们将亲情、爱情抛之脑后。《道之动》中桑果的妻子篁，在与桑果儿结婚后，因为自己的虚荣心，逼桑果儿费尽心思去往美国工作，却发现美国的生活远不如国内。桑果儿的任劳任怨没能安抚篁的势利与欲望，篁要钱要房要车，将桑果儿逼成一个只能去赚钱的机器。再如《罗坎村》中罗清浏的妻子，在无穷无尽的欲望驱动下，她逼迫罗清浏放弃体面的工作和优渥的生活，期望能够去美国赚取更多的金钱，然而身处国外他们只能从零开始，可国内国外的生活水平变化太大，妻子内心的落差难以填平，她便斥骂、扇打罗清浏，使罗青浏毫无做丈夫的尊严。更令人惊奇的是，罗清浏的妻子有藏金癖，她将贵重首饰藏在臭烘烘的马桶底下，还随身携带家里所有的现金。毫无疑问，她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甚至还要奴役丈夫满足自己的对物欲的贪婪与渴求。

最后，在金钱的引诱下，人们展现出理性的迷失。《青门里志》中，改革开放后，兽性的贪婪和压抑已久的性欲望在人身上复苏，周丕良贪污研究生的科研经费，榆钱利用山东官员的黑钱赚了个盆钵瓢满，提供性服务的“洗脚房”“洗头房”在市场需求下站稳脚跟，八爷富裕后与丫头私通，还美名其曰“投资”。在新时期，钱和性呈现出齐头并进的发展势头，人们如“博诺波猿”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不加克制，从而造成理性的失落。

袁劲梅既承继了五四以来鲁迅、胡适等人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又清醒地觉察到其在新时期展现出的新特点，这离不开她对于社会与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切身感受。国民性批判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匡时济世”的文人精神，也造就了皇权的“忠臣”；其文化精髓既保证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又养成了人的惰性。况且，在新时代新阶段，国民性又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总之，袁劲梅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揭露，呼唤理性思考的回归，高扬个体的生命价值，是五四启蒙精神与知识分子情怀的又一次光彩绽放。

### 第5章 学者化的叙事风格

袁劲梅是一名学者型作家，在哲学领域的多年深耕不但使她在专业领域获得不小的成就，更使她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展现严谨求实的学者魅力。读她的小说，我们常常有感于作品中哲理思考的呈现、知识学问的介入和哲学经验的生发，而她所教授的逻辑学也使她惯用问题推演式的逻辑来展开叙事。另外，文中幽默的讽刺也中和了学者化小说的枯燥，达到了思想深刻与风格幽默的统一。

#### 5.1 哲理性创作思维

袁劲梅以哲理性思维进行创作，在其小说中叙述者经常跳出叙事之外，对事件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做出评价，或借人物之口对某些社会现象做出阐释，这些评价和阐释往往是鞭辟入里和发人深省的。袁劲梅采用干预性叙事手法，将预设的主题理念呈现给读者，也在干预中完成了对整个故事情节的预示或升华。

首先，某些哲理性评论暗含预示的意义。《疯狂的榛子》中范笳河在某一次飞机失事即将跳机时，袁劲梅借怀尔特之口说“一跳下去，我们‘每一步都是迷失，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路’”[[[52]](#footnote-51)]。这句话出自但丁的《炼狱》，袁劲梅用在这里显然有她的独特寓意。事实上，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能否活着走出战争都是士兵们难以确认的事情，这句哲理道出了士兵们在战争环境中的虚无与迷茫，也暗示了范笳河之后的命运遭际。战争后的和平生活和与爱人的相偎相依是范笳河在战时的支撑，然而战争结束和平降临之后，信仰和主义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拆散了范笳河和爱人舒暖，更让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意义。范笳河为了政治任务与信仰走上了一条和幸福相反的道路，正是应了“每一步都是迷失”的预言。在后来写给马希尔上尉的一封信中，范笳河满怀愧疚地写道 : “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和我的女朋友并没能走到一起。这全是我对不起她。” [[[53]](#footnote-52)]“从天地宇宙看，我选的路是对是错，就跟蜉蝣蝼蚁走的‘Z’字一样，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天地有正道。再走多少‘Z’字，还是要回到正道上来。”[[[54]](#footnote-53)]晚年的范笳河在反思中发现了中国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了民主、公平、法律等的重要作用，在离开这个世界获得了“禅意”的平静。一生的坎坷与迷失，最终是在生命的尽头寻到了正确的路，不得不说，这里展露出袁劲梅对他的悲悯和宽恕。

《忠臣逆子》中，袁劲梅开篇以“戈壁滩的大黄布”作为底色，映照出生命与人性的“翻动”。她说：“那黄布是活的，有生命。那黄布起伏翻动，哪是忠、孝、仁、义、信能镇住的？”[[[55]](#footnote-54)]大黄布是指没有“忠、孝、仁、义、信”假象的生活，从“大黄布”来的奶奶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戴家“洞穴”似的大宅院将具体的人押进“忠孝仁义信”的笼子里，而身在其中的人根本没有意识，更不必说去寻找出路。艳芸一生的悲剧便是这传统文化“洞穴”中打造的。她的一生仿佛活在假象当中，从小被当成童养媳，等着一个从未谋面的丈夫，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她的丈夫也不承认她的妻子身份；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妻子身份，她被要求“守节”，然而她到底是为谁“守节”呢？最终，因为违背了大宅院里的守节法则，她被所有人针对，只有“奶奶”对她一如往常。在“忠孝仁义信”的生活假象里，艳芸如同一枚棋子被掷来抛去。然而，事情还不算绝望，作为后人，“我”走出了生活的假象，“当我从一个团体家族的价值系统，跳进另一个个体人性的价值系统，我就走出了这个残墙断壁的‘镜花缘’”[[[56]](#footnote-55)]生下私生子的“我”去往美国，在同学的开导下，猛然意识到沉重的“婚姻”和压抑的道德伦理不过是“自由”问题，人性应该置于伦理道德之上，这正应了袁劲梅在开篇的预示；“洞穴”的假象压不住“大黄布”的生命力。

其次，袁劲梅小说中更多的还是对故事情节的升华式的哲理性评论。如《青门里志》中，袁劲梅借伽伽的情书道出了等级制的根源，“这是一块先天不足的土地，没有老祖宗告诉我：‘人生而平等’”[[[57]](#footnote-56)]，直接道出了中国文化土地对等级制形成的根本性作用：在中国文化戏局上，人物的行为和选择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句话对全文的主旨进行了收束。再如《明天有多远》中，戴家第一代文人，怀着“匹夫有责”“为民请命”的使命感，毫不犹豫地踏上变革的道路，为了中国更好的明天而奋斗，可历经千辛万苦后，当年反掉的糟粕与陋俗却在新时代重返。戴家第二代文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相应国家号召，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大力兴实业，然而也被各种各样的中国规则所阻碍。其中有一个情节格外令人痛心，为了改变中国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我”打算培养中国贫苦地区的师资，通过一系列努力，“我”筹集到教师的工资，可是老师们来之前却有个条件，那就是领导先来，美名其曰“道路疏通”。想干实事怎么那么难呢？袁劲梅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原因，“别指责玩游戏的人，职责游戏本身”[[[58]](#footnote-57)]，引导读者将矛头对准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家族关系，我们恍然大悟：正是人情社会、等级社会的行事规则将众多文人的兴国路变得弯弯绕绕。通过哲理性评论，袁劲梅将情节的荒唐上升为对中国三千年传统文化的批判，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和内涵，反思力度更加深刻。

小说中这些哲理性的议论给小说增添了哲理色彩和思想容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叙述者对文本思想的过多阐释这也使小说呈现了一种非常“满”的状态，这种将故事情节与哲理性思考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一方面干预了读者的阅读节奏，另一方面也压制了读者思考和阐发的自由。

#### 5.2 学理性表达方式

源于学术领域的影响，袁劲梅的小说文本展现出丰厚的知识底蕴和清晰的“逻辑推理”痕迹。她以历史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知识作为理论基础，在故事开场提出问题和论点，接着通过一步步分析论证得出结论，最后以理性之思寻找解决方案。

**5.2.1 丰厚的知识底蕴**

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个创造和虚构的过程，相较于小说，学术研究倾向于求证、呈真，因此学者作家的小说展现出对现实的尊重和对历史原貌的呈现。作为大学教授的袁劲梅自然具有“学院派”的思维方式，她以实事求是和严谨求实的态度进行小说创作。具体体现为小说中以大量的引经据典的方式，将各类知识介入叙事，并且她谨慎地运用各类文化资源，丰富文章的知识底蕴。

首先，袁劲梅选取真实的历史知识介入写作。《疯狂的榛子》是一部以抗战历史为题材的小说，袁劲梅立足于国际化视野，描写了中美联合航空军在抗战中的艰辛经历。身为学者，袁劲梅在文学创作中始终秉持着对客观史实的敬畏。在《疯狂的榛子》创作谈中，她谈到自己所做的准备，“等我看了上百本回忆 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后（从老飞虎队进入中缅印战区到二战结束），有一次上逻辑课，和学生谈了一点当年的美国第十四、二十航空军在中国的空中战事，学生说：‘您教历史吧，这个好听。’这时， 我想，我可以开始写了。” [[[59]](#footnote-58)]再看文中，袁劲梅以题注、注释的方式将解释文人名言、总统语句，并且将文中的事件注明报刊来源。采用学术论文中常见的“注释”来对情节进行补充说明，给读者一种有根有据的真实感。文中，她对飞机的型号、作战路线、对敌战略等进行了细致的呈现，这些真实可感的细节无疑丰富了抗战历史的面貌，也增加了文本的知识容量。另外，在《疯狂的榛子》一书的结尾，她用了四页记录参考文献，光中英文的专著就有四十多本。严谨的治学态度表明了她对历史的尊重，也呈现出她以历史知识介入叙事的学者化写作风格。在所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袁劲梅以科学求证的精神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性，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打开了历史叙事的新范式。

其次，作为一名哲学教授，袁劲梅以人物的命运和小说的情节承载哲学知识。她的某些小说文本似乎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注解，十分具有深刻性。如《绿豆儿》一文中，绿豆儿关于自由与死亡的辩答让人不禁思考“存在与自由”这一哲学命题。对于自由，绿豆儿认为“自由只不过是一个意念。就像一束光、一缕云，属于你，可又不是你的。当你和大地拥抱、和蓝天相融的时候，自由是你的，谁也拿不去的.....而当你把自由拿来估价的时候，自由就不在了，就变成了一个或大一点儿或小一点儿的风房”。[[[60]](#footnote-59)]对于死亡，绿豆儿表现出道家哲学的超脱，她认为：“死亡本身并不恐惧，反而要带走恐惧，还给你永恒自由呢。死亡所以显得恐惧，是因为它把所有人们看重贴价值都变成了零......但零却并不都是坏东西，它只是一个衬托生命意义的起点。”[[[61]](#footnote-60)]在她看来，自由是抽象的，它更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精神和意念，不能被具体定义；死亡是大自然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人的终点，但也是生命的起点，不应过度恐惧。绿豆儿对自由的理解和面对死亡的淡定从容，渗透着袁劲梅对“存在”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揭示。

小说《道之动》直接从题目上看，便能了解袁劲梅以小说作为载体展现哲学命题的用意。“道之动”出自《道德经》第四十章，原文为“反者，道之动”，后世对其有两种解读，“一种释为相反、对立面, 即辩证的‘反’。另一种释为‘返’, 即返本复归的‘反’。”[[[62]](#footnote-61)]在小说中，桑果儿的人生走向便暗含了这种哲学思想。桑果儿出生在“双野溪”。“天地浑沌未开的时候没有梦，双野溪是从浑沌中挤出来的。”[[[63]](#footnote-62)]对比老子“道”的哲学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4]](#footnote-63)]，即，道是万物之根，万物之源。从这一描述来看，袁劲梅笔下的“双野溪”带有“道”的意味。桑果儿在双野溪上修船板、漆船舱，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天性，然而读书之后的他发觉自己身上存在“自我分裂”的症状，一个桑果儿还带有双野溪的自然、淳朴和野性，而另一个桑果儿因自己的社会角色而不得不变得文明、拘谨。“桑果儿时常想，也许所有人的天生就该分成一野一文两个角色，只是人在社会角色里时间长了，便忘了怎么演自己本来的那野角色。”[[[65]](#footnote-64)]确实，事物是相反相成的，袁劲梅对“自然”的回望也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现代文明的社会身份。然而，事物发展的过度，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进了军校、社会的桑果儿为了追求文明，始终压制着“双野溪的桑果儿”。桑果儿便成了一个只会服从的机器，体现了“道之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后果。最后，桑果儿重新唤醒“双野溪的桑果儿”，寻找“抱朴之初的小欲望”，才将人性捡拾了回来，获得了心灵上的安宁与充实。“反者，道之动也”，意味着人终要向“自然”寻找自己的终极价值。袁劲梅以冷静旁观的叙述姿态，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来阐发深奥的哲学命题，并论证出文明并不是越发展就越好，呼吁人们保持自然的人性。

另外，在探究小说的历史反思与文化批判主题时，袁劲梅不仅仅满足于描绘现象，她积极向其他领域的知识寻求答案。在《青门里志》中，她借鉴了富兰斯·德·瓦尔教授及其科研小组关于人类动物亲戚的研究成果，并在文中设置《科安农-苏邺风观察日志》，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比人与兽的异同，再融合进“全民返祖”历史的反思中。同样，她借鉴心理学领域著名学者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来反思那一时代人民的群体无理性，从而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在《疯狂的榛子》中，她引入“PTSD”现代心理学病症探讨军队伦理和传统文化带给人心灵上的深刻创伤，进一步呼应反战主题和对和平的呼唤。

透过袁劲梅的小说，我们总能感受到她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幽深。她“用学问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经验，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体…… ”[[[66]](#footnote-65)]其小说既包含生动的情节内容，又能跨越各领域，展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增添了小说的知识含量与思想厚度。

**5.2.2 问题推演式的逻辑文本**

关于小说的文本结构，袁劲梅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有时候是故意用了‘开场，故事文本，结论’这样的结构的。”[[[67]](#footnote-66)]她以题记、章节标题以及名言警句的引用抛出问题，提出明确的论点，以各类文化资源当论据，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完整的论证。在小说中，她既呈现问题，也以理性之思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方案。

《青门里志》便是以这种文本逻辑展开的。文章开篇，作者先引用易卜生的名言，指出每个人都需要对罪恶的历史负责。接着在第一章首先将弥尔格林实验及结论呈现给读者，即“普通人均有服从权威的天性”[[[68]](#footnote-67)]，又将两种人类动物祖先的习性展示出来，接着引出问题，“为什么故事会这样发生”[[[69]](#footnote-68)]？，“用‘我们是上当受骗’来解释我们干过的坏事，是不负责任的开脱”[[[70]](#footnote-69)]。在“我的故事背景”中，作者又将百年来中国改革像“掰棒子”一样的混乱情况呈现出来，到这就形成了完整的论点——追究每一个人在百年混乱历史中的责任。

第二章到第三章，袁劲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论述全体人民的责任。首先是红卫兵们在极端红色文化的感染下，由抄家、杀兔子，发展为打人，甚至打死人，其人性中残留的兽性在群体心理中完全激发出来，在与人性的博弈中占据绝对上风；其次是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作为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始终默不作声地接受，只有当子辈做得过分时才加以制止；还有儿童们，正是爱好学习和模仿的时候，在错误价值观的示范下，变成了一群斗父母的“小禽兽”。在这一部分，无论是打人的还是挨打的，连小孩子都是罪恶的制造者，都需要为社会的乱象负责和反思。

第四章至第五章，袁劲梅将矛头对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妈”被批斗、被剃阴阳头，甚至还有生命之忧，但获得安全之后的她第一时间并不是独立思考，反而是“进京告御状”，“忠”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传承至今，并根深蒂固；剪子巷是市民文化场域，也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这里的市民不遵守法律，只按照巷子里的规矩行事，多大的变革都无法撼动传统文化基础，每个市民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神载体；红卫兵分出帮派，为了争个高下打得头破血流；阶级斗争闹得善良忠厚的马姑爷被批斗，安分守己的四姑娘羞愤自杀；红鸟和伽伽的婚事不被看好，只因为“种”的差异。中国文化磁场造就了等级制的框架，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找到位置，阶级斗争的惨剧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恶果。

第六章，袁劲梅写出新时代的新问题。“市场开放”之后，人们从“文化大革命”转到商业资本的纵欲。青门里的少年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成绩，但讽刺的是，小喇叭勘探大自然的矿藏，小竹子“扒”有年头的老房子来创造效益，剪子巷也面临着拆掉重建仿古民居的窘境，似乎新时代的经济靠破坏来拉动。“钱”和“性”也呈现复苏的势头，陈榆钱的绘画艺术走向了歪门邪道，返回祖国大搞现代主义而赚得盆满钵满；“洗脚房”“理发店”作为“万花楼”的现代版本被迎进新时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剪子巷拆了，传统糟粕“万花楼”却回来了。袁近梅悲哀地指出，在新时代人的兽性又一次复苏，刚经历悲剧的人们没有进行彻悟的反思，而是再一次陷入“市场”狂欢，改革怪圈循环往复。

最后，在“蓝眼睛，棕眼睛”一节中，袁近梅开始寻找答案。从“文革”到市场经济，有一个人一直没变，那就是“吕保姆”，她的善良对抗成功了兽性和疯狂的群体心理。袁劲梅感叹道：“人性和兽性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也许只有‘善’可以和随便什么圈儿共存。”[[[71]](#footnote-70)]袁劲梅还借人物科安农之口，讲述了“蓝眼睛，棕眼睛”的故事，呼吁让学生们从小思考划分等级的危险性，培养孩子的宽容，尊重等级面具下的人性。

从开场提出论点，到中间部分描述每个人对恶的责任，重现百年来的改革怪圈，到最后提出“善良”“包容”的重要性，袁劲梅在逻辑文本中展现问题并回应问题。不得不说，教授“逻辑学”使她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演绎方面驾轻就熟，在长篇小说中以完整的逻辑结构论述，展现了她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清醒的问题意识。

#### 5.3 讽喻式写作风格

知识蕴含与哲理思考本会使小说读来艰涩，但袁劲梅讽喻式写作风格却很大程度上中和了这一缺点。在文中我们常见其运用强烈的对比、恰当的典故、荒诞的情节和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讽刺性，其语言幽默风趣，展现出深刻思想与幽默表达的统一。

首先，袁劲梅擅长在强烈的对比中凸显讽刺意味。在《九九归原》中，袁劲梅塑造了“杨纠”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是一名哲学领域的学者，专攻伦理学，每次开会都要讲一些关于“德性”的论文，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生活中的他却是家暴老婆的恶劣男人，在强烈的对比中，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与虚伪自私便显露无疑。《青门里志》中也有类似的对比。“文革”时期，学识丰富的“杨老师”被遣送回乡，代替杨老师的新老师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大姑娘，她“把‘绿颜色’说成‘六颜色’，把‘紫颜色’说成‘四颜色’。第一天上课就把‘眼帘’念成了‘眼吊’。”[[[72]](#footnote-71)]教师本该是学富五车、诲人不倦的神圣形象，可是这位新老师却“大字不识”。这样的人被安排来做一名教师，可笑的身份冲突中透露出“文革”时期一切以政治身份为标准的荒诞。

其次，袁近梅使用典故讽刺国民的劣根性。方世玉是《九九归原》中的一名哲学教授，袁劲梅将其比作“侯方域”。侯方域何人也？袁劲梅借主人公之口讲述了他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他俩彼此相爱，却因战乱各自颠沛流离多年，终于某一天，相爱的两人偶然相遇，却碍于“国已不存，焉能说爱”的公众看法，而先后出家当了和尚、尼姑。方世玉也是如此，他的爱情爱到不影响他的社会名声为止，爱情永远是事业的附丽。袁劲梅悲哀地感叹：“中国的儒生进化了几千年，出了个方世玉，到顶还是个侯方域。”[[[73]](#footnote-72)]在这一比喻中，袁劲梅批判了传统等级制和人情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印证了在中国文化里人性和人际关系本末倒置的可悲现象。

《罗坎村》中也运用了恰当的典故喻人。文中，前夫随我回罗坎村“带职锻炼”，他拿着自己的“中央党校学习证”招摇撞骗，享受虚妄的权力带来的满足感与虚荣心，于是“我”将前夫比作“石壕吏”。“石壕吏”是杜甫诗歌《石壕吏》中代表朝廷的官差，在夜晚凶狠地捉人入伍。两相对比，突出了前夫“石壕吏”的利欲熏心以及实际上被权力操纵了的真相。格外有趣的是，在整篇文章中前夫一直被称作“石壕吏”，从这我们不难看出袁劲梅的戏谑：完全被权力浸透的前夫叫什么都无所谓，他只是权力的人形载体，其真实人性早已埋葬在心灵深处。通过这一比喻，尖锐的批判便委婉的传达了出来。

再次，袁劲梅利用情节的荒诞完成对历史与文化的讽刺。《青门里志》的榆钱本师从国画大师“燕吟爸爸”，但在商品经济时代榆钱另谋新路，搞起了“行为艺术”。他脱光衣服钻进巨大的玻璃瓶子中，再请朋友往瓶子里不停地倒冰块，最后他逃脱出来，意在诠释“自由”的艺术精神。然而美国人认同的“自由”是精神自由，而非行为自由，这名为“自由”的行为艺术以榆钱被拷到警察局而告终。榆钱哗众取宠的行为反映了在新时代人们急功近利，反丢了优秀文化传统的悲哀。来到美国的榆钱单打算享受“自由”的概念，却模糊了“自由”的边界，情节的荒诞透露出袁劲梅对于时代的省思和对国民的讽刺。《疯狂的榛子》中，袁劲梅以“认罪书”的形式，将“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对人的极端打压呈现出来。南诗霞不但被称作“南死虾”，她还要虚心接受这一称呼，并分析自己的“罪恶发家史”以及洋方资本家的“恶行”。在“认罪书”中我们发现，好人必须被打成坏人，好事必须被分析成坏事，中外之分、阶级之分成了判定一切的标准。更可悲的是，南诗霞作为一名作家，其文学作品被当成“毒草”，她只能凭借“认罪书”书写文学化的语言，这一荒诞情节的描写直接反映了袁劲梅对于历史的讽刺与对国民的悲悯。

最后，袁劲梅总是以幽默、贴切的比喻表达对人与事的戏谑。《老康的哲学》中，袁劲梅描绘了老康初见“我”的情景。“老康在认识我的那天，对我使劲点头，因为支点的位置还没有调整好。对待女人，且是让老康动了心思的女人，这支点的位置就不太好调。”[[[74]](#footnote-73)]处在等级结构中的老康，只学会了仰视比自己等级高的，俯视比自己等级低的，在需要平视身边人的时候，他却显得茫然无措起来。将老康的脖子比作“支点”，既表现了袁劲梅对老康的挖苦，也传达出其对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的洞悉与达观。在《九九归原》中，袁劲梅评价了知识分子追逐权力的可笑行径。“这个哲学会的主席又是个什么官？既无粮草又无兵马，为大家张罗张罗而已，最大的好处也不过就是回国开个会，可以有一面大旗打着，招呼几个哲学名人到旗子下站一站而已。就这样的位置也还要煞有介事地争一回，像争皇位一样。”[[[75]](#footnote-74)]袁劲梅把现代知识分子的争权夺利与古人争皇位相类比，使一群知识分子仿佛变成招军买马的古代兵匪，这种快乐戏谑的比喻形式背后，是她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刻透视。

袁劲梅的讽刺艺术实际上体现出她对于社会人生超卓的达观与洞悉，通过幽默的讽刺，她将尖锐的批判、深刻的思考与趣味的生活连接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者化叙事风格带来的说教感和艰涩感。另外，在引经据典的讽刺中，她打通了古代与现代的时空界限，将现代社会中的人物行为投射到古代人物身上，一方面凸显了其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在调侃戏谑中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底蕴。

**结 语**

作为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中的一员，袁劲梅以其批判的彻底、思想的深刻别具一格。对文化与历史的反思及对人性的悲悯，是她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体现了她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强烈关切。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她也为我们示范了小说创作的学者化风格，这是她在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中的一个重要标识。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一点事，就是寻找。”[[[76]](#footnote-75)]袁劲梅秉持着寻找真理的创作理念，无情地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民性格，并结合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等多领域知识理性地探寻“人何以至此”。她在改革怪圈和暴力战争的书写中诘问“平庸之恶”；在书写三千年的传统文化痼疾时，堪透“谁弱小就吃谁”的等级制本质，并由此生发出对一整个传统文化全面的反思与批判；在审视文化磁场中的国人时，她清晰的发现了国人的思想麻木、精神的奴性和人性创伤，在冷酷的批判中传达出对人性的悲悯。作者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去反思历史文化，追问人性价值，呼唤和平回归与人性解放，凸显了知识分子情怀与对人文精神的坚守。

袁劲梅小说具有鲜明的学者化风格。她以治学的严谨态度进行小说创作，旁征博引，丰富文章思想内容，同时也积极向其他知识领域探索，展现“跨界写作”的勇气。哲学领域的研究也使其一方面以哲理思维观察问题，在文本中渗透大量的哲理思考，另一方面，也以一种问题推演式的叙事方法呈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展现了逻辑的魅力。其幽默的讽刺艺术，也体现出身为学者的从容与超然。

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袁劲梅小说中存在主题先行、叙述者干预过度的问题，并由此导致了人物形象的概念化、主题与情节的重复、小说阐释空间狭窄等问题。另外，由于去国离乡使经验固化，从而使小说里中国的形象存在片面化问题。不过，袁劲梅以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向历史文化提出质疑，在独立清醒地思考中传达深刻的哲理，这种文学创作对于文学和社会是弥足珍贵的。我们期盼袁劲梅能始终坚持独立的写作立场和深刻的批判风格，在异质文化空间坚持观察生活、更新经验，为北美华文文坛持续提供精品佳作。

**致 谢**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迎来了尾声。回望从研一至研三的一路成长，非常幸运，我遇上了一群温暖又善良的人。这一路的相知相伴，让这三年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在这即将毕业之际，我要向每一位给予我帮助的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李洪华教授。李老师教学严谨、学识渊博、眼光独到，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不断前行。正是李老师的指引让我找到了合适且喜爱的研究方向，也正是李老师的指导让我能够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一直走下去。感谢李老师在这期间对我的悉心教导，为我指点迷津，再次向李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感谢与最诚挚的祝福。

其次，我要感谢一直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朋友们。感谢寝室里的三姐妹以及我的心上人，与你们相伴，让我三年研究生时光不再乏味，转而变得充实、温馨又快乐。感谢同专业的小伙伴们，与你们同处，让我收获了深厚的友谊。祝愿所有小伙伴们都能学业顺利、心想事成。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父母二十多年对我的支持与关爱。是你们在背后的鼓励与理解，让我能够无忧无虑的享受学习生活，让我能够坚定地走自己喜欢的路。

再一次感谢身边所有人。毕业在即，新的旅途即将开启，我将带着你们的祝福继续前行。愿我们相识于微，重逢于炬！

**参考文献**

**作品：**

1.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工人出版社 2004 版.
2.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版.
3.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版.
4. 袁劲梅.忠臣逆子[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5. 袁劲梅. 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

**著作：**

1. (美)W .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陈谦.美国两面派[M]序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3. (美)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刘登翰主编.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 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5. 丰云.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8. 刘俊选编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中篇小说卷[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宝文堂书店，1988.
11. 刘广明，王志跃.中国传统人格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 谭君强.叙事伦理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5.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6.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8. 徐岱.小说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9.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20.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1.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2.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3.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3.
25.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6.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王浩宇.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7. 反杜林论［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72.
28. 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期刊论文类：**

1. 从晓峰.试论新时期的学者小说[J].山东师大学报，1997(4).
2. 郝朝帅.海外写作的-种“症候”--由《罗坎村》谈起[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2).
3. 李伟民.论人情一-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1996(2).
4. 李雪梅.论袁劲梅的小说创作[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2(6).
5. 刘复生.普世主义的文学残梦- --以袁劲梅小说《罗坎村》、《 老康的哲学》为例[J].南方文坛，2010(2).
6. 柳珊.阐释者的魅力[J].当代作家评论，1999(1).
7. 欧阳光明.新移民作家理念写作的尴尬与危机---以袁劲梅小说为例[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
8. 汪注.《青门里志》的思想意蕴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4(6).
9. 王泉.文化焦虑与人性守望[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2).
10. 王晓霞.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文化传承[J].南开学报，2000(3).
11. 夏一雪.学者创作:打通文学与学术[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2).
12. 喻大翔.知识分子·学者·学者散文[J].当代文坛，1999(6).
13. 袁劲梅，傅小平.我唯--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J].黄河文学,2012(12).
14.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创作谈[J].南方文坛，2016(4).
15. 高文惠.当代流散写作的文化身份特征[J].电影文学, 2008 (4) .
16. 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J].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2006 (2) .
17. 傅小平,袁劲梅.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N]. 文学报,2015-10-08(002).
18. 刘钰琦.道行于其中——论《道德经》中“反者,道之动”[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47-50.
19. 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J].读书，1982:19-26.
20. 吴卫东.画皮主人公的人格面具和暗影分析[J].电影文学，2003,8：58.
21. 刁克利.美国作家教育背景与写作环境分析——兼谈作家理论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5):146-153.
22. 陈瑞琳.“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J].华文文学,2007(05):35-39.

**学位论文：**

1. 杨华.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山东大学，2012.
2. 郑小妹.试论新时期学者小说的思想价值[D].福建师范大学，2012.
3. 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 ——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D].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4. 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研究[D]. 李晓鸥.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5. 人性刻写与文化省思:袁劲梅小说论[D]. 王萍.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7.
6. 秦姣娟.论北美新移民小说中的去离散特质[D].宁波大学.2018年.
7. 庄婉琳.论小说留白.南京师范大学[D].2019年.
8. 秦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D].江苏师范大学.2016年

哲学类书籍：

1.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饶荒子著,2005[2]鲁迅散文全编[M].滴江出版社﹐金隐铭编订,2005
2.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M].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仲主编, 2000
3. 中国古代文论史[M].岳麓书社﹐赖力行著,2000
4. 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英)罗素(BertrandRussell)著，1976
5.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 陈瑞琳.“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J].华文文学,2007(05):35-39. [↑](#footnote-ref-0)
2. []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转引自饶芃子，《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3. [↑](#footnote-ref-1)
3. [] 袁劲梅，傅小平.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J].黄河文学，2012(12). [↑](#footnote-ref-2)
4. [] 刁克利.美国作家教育背景与写作环境分析——兼谈作家理论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5):146-153. [↑](#footnote-ref-3)
5. [] 顾学文. 袁劲梅:做学问就不是件热闹的事[J]. 决策探索(上),2018,(11):80-83. [↑](#footnote-ref-4)
6.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57. [↑](#footnote-ref-5)
7.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J].动物学杂志，1966(04):145-146. [↑](#footnote-ref-6)
8.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56. [↑](#footnote-ref-7)
9.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59. [↑](#footnote-ref-8)
10.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5. [↑](#footnote-ref-9)
11.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 [↑](#footnote-ref-10)
12. [] 傅小平,袁劲梅.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N]. 文学报,2015-10-08(002). [↑](#footnote-ref-11)
13. [] 反杜林论［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上 .人民出版社 ，1972 ：144. [↑](#footnote-ref-12)
14.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12. [↑](#footnote-ref-13)
15.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17. [↑](#footnote-ref-14)
16. []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王浩宇.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3~4 . [↑](#footnote-ref-15)
17.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84. [↑](#footnote-ref-16)
18. []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王浩宇.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1. [↑](#footnote-ref-17)
19.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13. [↑](#footnote-ref-18)
20.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14. [↑](#footnote-ref-19)
21.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33. [↑](#footnote-ref-20)
22.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17. [↑](#footnote-ref-21)
23.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23. [↑](#footnote-ref-22)
24.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43. [↑](#footnote-ref-23)
25.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321. [↑](#footnote-ref-24)
26.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322. [↑](#footnote-ref-25)
27. [] 傅小平,袁劲梅.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N]. 文学报,2015-10-08(002). [↑](#footnote-ref-26)
28. [] 袁劲梅.月过女墙(自序)[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footnote-ref-27)
29. []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2. [↑](#footnote-ref-28)
30.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73~274. [↑](#footnote-ref-29)
31.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398. [↑](#footnote-ref-30)
32.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98. [↑](#footnote-ref-31)
33.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98. [↑](#footnote-ref-32)
34.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98. [↑](#footnote-ref-33)
35. [] 傅小平,袁劲梅.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中)[N]. 文学报,2015-10-08(002). [↑](#footnote-ref-34)
36.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42. [↑](#footnote-ref-35)
37.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91. [↑](#footnote-ref-36)
38. [] 袁劲梅.忠臣逆子(自序)[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footnote-ref-37)
39. [] 袁劲梅.忠臣逆子(自序)[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footnote-ref-38)
40.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59. [↑](#footnote-ref-39)
41.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17. [↑](#footnote-ref-40)
42. [] 袁劲梅.月过女墙(卷首语)[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footnote-ref-41)
43.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40. [↑](#footnote-ref-42)
44. []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 A ]. 鲁迅全集 (第四卷 )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footnote-ref-43)
45.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60~161. [↑](#footnote-ref-44)
46.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85. [↑](#footnote-ref-45)
47. [] 傅小平.袁劲梅：文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于“进谏”[N].文学报.2012（003） [↑](#footnote-ref-46)
48.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342. [↑](#footnote-ref-47)
49.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34. [↑](#footnote-ref-48)
50. [] 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36 . [↑](#footnote-ref-49)
51.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82. [↑](#footnote-ref-50)
52.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870. [↑](#footnote-ref-51)
53.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42. [↑](#footnote-ref-52)
54.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346. [↑](#footnote-ref-53)
55.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6. [↑](#footnote-ref-54)
56.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50. [↑](#footnote-ref-55)
57.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22. [↑](#footnote-ref-56)
58.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378. [↑](#footnote-ref-57)
59. []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创作谈[J].南方文坛，2016:77-79 [↑](#footnote-ref-58)
60.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31. [↑](#footnote-ref-59)
61.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34. [↑](#footnote-ref-60)
62. [] 刘钰琦.道行于其中——论《道德经》中“反者,道之动”[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47-50. [↑](#footnote-ref-61)
63.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49. [↑](#footnote-ref-62)
64. []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7. [↑](#footnote-ref-63)
65. [] 袁劲梅.月过女墙[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57. [↑](#footnote-ref-64)
66. [] 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J].读书，1982:19-26 [↑](#footnote-ref-65)
67. [] 袁劲梅，傅小平.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J].黄河文学，2012(12). [↑](#footnote-ref-66)
68.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 [↑](#footnote-ref-67)
69.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1. [↑](#footnote-ref-68)
70.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4. [↑](#footnote-ref-69)
71.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3. [↑](#footnote-ref-70)
72. [] 袁劲梅.青门里志[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1. [↑](#footnote-ref-71)
73.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24. [↑](#footnote-ref-72)
74.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233. [↑](#footnote-ref-73)
75. [] 袁劲梅.忠臣逆子[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188. [↑](#footnote-ref-74)
76. [] 袁劲梅.忠臣逆子·自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footnote-ref-75)